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亲历者言】	武汉地区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上）	杨道远
【往事非烟】	棚友吴宓	谭优学
【青春有悔】	在风暴中心	杨 瑞
【亡灵祭坛】	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	解 滨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亲历者言】

武汉地区文革初期的“五十天”（上）
——《武汉地区文革纪实》选载

• 杨道远 •

第一章 文革初期的“五十天”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这一概念，出自毛泽东1966年8月5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里提到的“五十多天”，是指1966年6月上旬到7月下旬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全国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都是由各级党委派出的工作组领导，其矛头所向，不是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强调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一直被“专政”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和持“不同意见”的群众。同时各省及地、市党委及时抛出非主流领导干部组成的“黑帮”，不久以后他们纷纷检讨说不经过群众运动急忙抛出“黑帮”是为了保自己。

这五十天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被毛泽东痛斥为：“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一般认为五一六通知是文革发动的标志。而武汉地区文革的发端，可以追溯到1966年4月18日——湖北省委向武汉大学派出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武大工作组组长李衍授1966年7月总结前一段运动时说：“（1966年）四月中旬，王任重同志在省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报告，就点起了武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火焰。”这句话也出现在武汉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1966年8月29日印行的《武汉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介》中。这份小册子印了数十万份，向全国散发。

第一节 批判“武大三家村”（1）

1966年4月10日，“中南局学术批判座谈会”在广州开始举行。13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讲话中提出要在中南地区搞一个“有权威的、有影响的、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对立面”来打，并点了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和中山大学教授容庚、刘节的名。其后，陶铸与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商量向武大派工作组。18日，以湖北省委名义派出的全国第一个教育革命工作组进驻武大。

这个工作组的首要任务就是整李达。李达虽是武大校长，但武大师生都清楚，他在武大并不“当权”。戚本禹1966年11月接见武汉造反派学生时说：“李达是不是当权派？不是吧？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吧！”〔2〕

4月21日至23日，王任重在武汉听取武大哲学系助教陆舒端关于业已收集到的李达等人材料的汇报，指示陆将汇报材料以给他写信的方式送省委，然后由他修改加按语，印发省委和武大党委，并上报中南局。

陆舒端在奉命写成的这封信中，揭发李达1956年重建武大哲学系的目的是“以此为据点与主席思想唱对台戏”，“通过编书、学术讨论等方式”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幌子，贩卖的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黑货”。“李达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研究室，是一所反毛泽东思想的据点，所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风，都是在那里吹出来的”；武大哲学系的教师是“一批反毛泽东思想的打手”。

陆舒端的信还揭发李达与武大前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党办主任牛永年之间的“黑组织关系”，说他们“狼狈为奸，组成了资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李达是这个核心的王牌”，“朱、何、牛利用李作王牌与中央、省委相抗衡”。

25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学术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讲到了武大哲学系和中文系的问题。王任重说：“这次文化革命的斗争对象是知识分子”，要在知识分子中抓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

三天后（28日），武大党委书记庄果向全校党员传达王任重的报告，说这个报告是省委在文教界抓右派的“战斗动员令”；并宣布省委确定武大为“教育革命”的试点，已派省委书记处书记许道琦、宣传部副部长史子荣来武大领导运动，会同武大党委成立“教育革命领导小组”。随后，在陆舒端组织下，正式形成《关于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由陆舒端等三人署名。

5月9日，王任重将这份材料上报中共中央时，附信给总书记邓小平说：“关于李达的揭发材料一份，我加了一点按语。请审阅。如中央同意，我即告武大党委首先印发给全校党员阅读讨论，然后发动全校师生进行批判。这是武大教育革命中要打倒的一个资产阶级权威，也是党内资产阶级当权派的主帅。”“省委决定先以武大作为试点，取得经验，逐步展开。”

邓小平口头通知王任重并批复湖北省委“同意任重同志的意见”，指示批判李达分三步走：第一步在党内进行批判，第二步在学校进行批判，第三步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

5月12日，陶铸在中南局扩大会议上宣布，批判李达，中央已经同意了，“批判李达是个大事，省委要派人去”。19日，中南局召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陶铸对批判李达“三

家村”作了部署，同时检讨自己1962年春的一次讲话：“讲创作自由过了头，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估计过高”。

12日，武大工作组召开全校动员大会，号召“彻底揭发李达的反党罪行”，再次强调要在武大抓右派。此后，武大连日召开此类大会小会。

6月3日，武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参加的紧急动员大会，由数学系总支副书记、省委工作组党委成员崔建瑞传达陶铸5月19日在中南局文化革命动员大会上的长篇报告，庄果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向珞珈山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的动员报告。

庄果在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武大三家村”：“我们学校也有一个‘三家村’黑店。李达、朱劭天、何定华是它的三个大老板，牛永年是‘三家村’黑店的总管。他们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把武大的领导权篡夺过去了。我们一定要把这条黑线揪出来，把这个‘三家村’黑店彻底粉碎掉，把学校领导权夺回来！”“现在我们宣布：从今天起，运动正式展开！”

6月7日，王任重为武大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而五一六通知已经提出当前开展的这一场全国性的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

6月10日，王任重在武大说：“上下左右一起烧。”此前李衍授说过：“不要限制群众，什么都可以搞，先来一个大暴露，再斗李达黑帮。”〔3〕

13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和省、市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向社会公布武大揪出“珞珈山三家村”。湖北日报第一版头条刊登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下半版以通栏标题“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遍珞珈山，武大揪出朱劭天何定华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刊出报道。报道说：“长时期以来，武汉大学存在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朱劭天、何定华和某资产阶级‘权威’等组成的‘三家村’黑帮，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疯狂地攻击一九五八年教育大革命，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抗拒省委领导，阳奉阴违，欺上压下，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扶植资产阶级‘专家’，把武大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武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复地进行了复辟与反复辟的尖锐激烈的斗争。”第二、三版则发表了武大师生批判武大“三家村”黑帮的大字报、文章。

14日至16日，省市报纸、电台集中报道全省、全市“人民以强大革命声威支持武大革命师生的斗争”、“坚决支持武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报纸在“愤怒谴责珞珈山‘三家村’黑帮的滔天罪行”的通栏标题下刊登了一批大字报。据《武大战斗报》16日报导：“截至15日晚上8时止，来珞珈山声援我校革命师生员工的共达两千多个单位近三十万人，送来声援书十万多张，声援信五千五百多封，从全国六十七个县市来电七百八十四份。”“目前，在全国、全省、全市、全校已经燃烧起了烧毁‘三家村’的燎原烈火。”

武汉锅炉厂职工王光照回忆当年去武大“声援”的情景时写道：

6月13日下午4时许，厂广播站广播了厂党委、工作队党委联署的紧急通知：全厂注意！全厂注意！全体职工立即以科室、车间为单位，到厂前广场紧急集合，参加重要的社会政治活动。各支部和各分工作队马上组织好职工参加，除特殊情况，一律不准缺席。这个通知就是冲锋号，全厂职工迅速地集合在广场，窃窃私议。王心学队长铿锵有力地简单动员

后，工人的队伍像抗洪抢险般地步行奔向武大，声讨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三反分子李达等黑帮。武大校园里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李达等三人的名字倒着写，并且打上了红叉叉。漫画极尽丑化、夸张，工农兵三只硕大的拳头，紧紧抓住“三家村”成员的细脖子，恰似抓住张皇失措的小鸡，工农兵的孔武有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这些参加声讨的人不知道李达等人的胖瘦高矮，他们是如何“三反”也不晓得，只是随着巨大的人流，围着李校长住的小楼，有节奏地呼喊那年月的战斗口号。这些口号和领呼人，据说全是工作队严格安排的。我生平第一次见证并参与了“运动群众”的宏大现场。我厂示威游行的队伍蹒跚蠕动，后面武昌造船厂、六机部安装公司的队伍一个劲地催：武锅的走快点。天哪！这么多人往哪走啊？又如何走得快呢？（4）

6月16日以后，报纸、电台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在持续中。24日的《武汉晚报》用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署名为“武大数学系战斗小组”的文章《一场极端严重的反革命迫害——控诉武大的“三家村”黑帮一九六五年在数学系的罪行》和《湖北日报》社论《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延续到30日，李达被公开点名。当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在头版《打垮武大“三家村”黑帮，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通栏标题之下，同时发表《李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揭发武大的“三家村”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两篇署名文章和湖北日报的“编者按”。“编者按”说：“李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长期以来，他挂着‘老党员’、‘老马克思主义者’的招牌，摆出‘名流’、‘学者’的架子，利用他窃取的领导权，一贯地、系统地、猖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大肆宣扬和推行他那一套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阴谋把武汉大学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一个阵地。”“武汉大学有一小撮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分子，李达是他们的大老板，保护人。武汉大学长期受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束缚，李达是这个镣铐的制造者。武汉大学的‘三家村’黑帮阴谋篡夺学校的领导权，李达是这个黑帮的主要人物之一。在他们阴谋复辟和革命师生反复辟的斗争中，李达赤裸裸地露出了他的反动的‘学阀’面孔，残酷地压制和打击革命师生。”

6月28日至7月17日，毛泽东在武汉。7月1日，王任重拟向已经来汉的毛泽东呈报《关于李达问题的调查综合材料》，并写下一段请示的话：“请主席阅。李达是个地主分子，又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即清洗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可否？请批示。”这一段时间，王任重每天都能见到毛泽东，但并没有向毛泽东呈报、请示李达问题。17日下午三时毛泽东离开武汉，当晚王任重召开省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除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李达党籍的决定》，次日发出。7月19日得知毛泽东在汉游泳的李达写信请毛泽东救他一命，要求秘书将信送毛泽东处。秘书将信交给工作队，工作队10天以后改换信封以机要文件寄中央。

8月4日，邓小平拟定的批判李达“三步走”计划的“第三步”开始实施——“登全国性报纸，公开进行批判”。当日，在陶铸的关注下，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坚决按照毛泽东思想办学的一面红旗——记武汉大学数学系半耕半读试验班同李达、朱劭天等黑帮作斗争中成长的经过》。

8月10日，毛泽东看到一张条子：“李达（武汉大学）要求主席救他一命”，没有看到李达原信。毛泽东在这张条子上批示：“陶铸阅后，转任重同志酌处。”陶铸批示：“即送任重同志。”这些批示没能救李达一命，重病的李达仍然无医无药，8月24日去世。

28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揭穿李达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说李达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可耻的叛徒，反革命围剿的急先锋”、“反共媚日的民族败类”、“蒋介石法西斯专政的帮凶”、“残酷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地主分子”。

9月5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批判李达的一组文章。9月11日，人民日报第四版发表一组工农兵学哲学文章，其中，全国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罗田县北丰公社四大队党支部书记丁凤英《把反动哲学“权威”打翻在地》一文说：“李达指的是我的名，但骂的却不是我个人。他骂的是我们广大工农兵……李达这样疯狂，我们不怕！我们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不要说一个李达，就是一千个李达，一万个李达，也不在话下！”

对武大“三家村”的批判，所涉及的远远不止李达等几个人。

5月10日下午，哲学系总支副书记、系教育革命工作组组长王师程宣称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党支部是“国民党支部”，是“反党活动的黑司令部”，立即解散。研究室人员除一两人外，都被打成“黑帮分子”，哲学系主任余志宏、副主任李其驹和系内一批教师被打成李达“三家村”的“黑干将”、“黑爪牙”。

武大党委15名常委，11名被打成黑帮；在武大1340名教职工中，被打成“三家村”“黑帮”的有214名，还有准“黑帮”即内定“黑帮”，也就是已经准备了材料或被抄家、减薪、批斗但还没有正式冠以“黑帮”之名的88名，共计302名，占教职工总人数的22.5%。还有一些学生也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分店”。

第二节 省、市委抛出批判对象

在1966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运动一开始省委抛出武大“三家村”和曾惇、陈一新，市委抛出程云“黑帮”，少数派批判说，这是阴谋，问题不在于这些人该不该打倒，问题在于省市这样做是“运动群众”，一个一个的“三反分子”由当权派抛出来，还有什么必要发动群众投入文化革命？

当时各级党组织大多抛出非主流领导成员、政敌、圈外人、“死老虎”等让群众批判，表明自己是紧跟中央的，证明本部门、本单位的文化革命运动“取得伟大胜利”。武汉医学院抛出的副院长殷传昭，是部队转业干部；华中师范学院抛出的教务长陶军，早就被定为“漏网右派”。武大“三家村”成员之一朱劭天，一年前已调离武大。湖北大学“三家村”的三人早已不在学校：原校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李光斗，1964年四清运动中被揭发批判，当年11月失踪；原校党委委员、组织部长兼人事处长辛永信，四清运动中下台，当时下放在咸宁；另一人两年前调离。8月28日湖北日报第一版刊登报道：《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湖北大学揪出了李光斗、辛永信黑帮》。

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的顾建棠回忆：“6月中旬开始，长办党委先后把副总工程师周尚，宣传部副部长陈亮，留苏副博士、长办科学院工程师陈济生，组织部干部科汪镇国，勘测处副总工程师李元亮，政工科长冯志沅，计划处冯明清等当作文革对象抛出来，在各自的办公室内外，用大字报揭发他们的‘罪恶’，以此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时任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办团委书记的黄世忠指示我，分批组织各单位的团员、青年去声讨、批判这些‘牛鬼蛇神’。”“7月23日至30日，我又接受了一项政治任务。政治部主任丁福五和副主任黄世忠指示我，把武装民兵连集中起来，用大字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文人、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田海燕。批判的材料由组织部

和纪监委提供，这是一项政治任务，一定要完成好。”田海燕“是只‘死老虎’。林一山和长办党委此时把田海燕抛出来，是为了转移斗争方向保自己。”（5）

一、市委抛出“程云反革命黑帮”

1966年6月17日，武汉市委召开全市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号召全市文化工作者“彻底搞掉以程云代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彻底粉碎以程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

此时程云已经被“粉碎”近两年了。武汉市委1964年8月发动的武汉文艺界“百日整风”中，程云受到批判，并被撤销武汉市文化局党委书记职务，下放工厂劳动。

7月6日，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开始点名批判程云，认为这是继揪出“武大三家村”后“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重大胜利”。

同日，武汉市委召开文化界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会上批判了以程云为首的“反革命黑帮”和市文联副主席、“右派分子”武克仁。程云“反革命黑帮”成员还有市文化局局长孙川四、市文联副主席于亚声、程云妻子莎莱，牵涉同为著名演员的武汉京剧团团长高百岁和武汉汉剧院副院长吴天保。1978年9月武汉市委作出《关于对程云等同志被定为“反革命黑帮”进行平反的决定》，讲到将程云等人定为“反革命黑帮”的原因，是“当时的市委没有识破林彪和‘四人帮’的罪恶阴谋”。

综合湖北日报、武汉晚报当时的报道，程云的“罪行”主要有三条：一是在政治上，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紧密配合，极力宣传资产阶级的“和平、民主、自由”，鼓吹阶级调和，抵制反帝、反修的斗争；二是在组织上，一面排挤和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面与文化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狼狈勾结，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黑帮；三是在文艺上，竭力推行以周扬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的文艺路线，使文艺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

二、省委抛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陈一新

1966年6月初王任重就决定批判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惇。8月29日，曾惇被湖北日报点名批判。此前省委已召开省直机关声讨大会，说已查明“曾惇是周扬黑帮的忠实走狗，是武大‘三家村’黑帮的后台老板，是省、市文艺界程云黑帮的总指挥，是前中宣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黑线在湖北地区的总代表、总头目。”省委负责人在会上宣布撤销曾惇党内外一切职务。曾惇何许人，李达何许人，说曾惇是李达的“后台老板”，当时心存疑问、不以为然的大有人在。

9月1日，武汉市召开“声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曾惇大会”。对曾惇的集会声讨、发表文章批判一直持续到10月下旬。

9月6日，省委常委、副省长、政法党组书记陈一新被公开点名批判，被指为“道道地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典型的新的贵族老爷”。8月19日省委已召开省直机关的声讨大会。省长张体学代表省委、省人委宣布罢陈一新的官，责令他彻底交代问题。

省委对曾惇、陈一新的公开批判，发生在少数派“炮轰省委”的高潮中。

文革前，湖北省的中高级干部主要有三种来源：以王任重为首的南下干部、以张体学为首的新四军五师干部、地下党干部。曾惇解放前夕任武汉地下党市委书记；陈一新是王明（陈绍禹）的远房弟弟，抗战期间在延安当过王明的秘书。

（未完待续）

□ 摘自《武汉地区文革纪实》：第一编 武汉文革的全面发动（1966年4月—1967年1月），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02年4月

~~~~~

## 【往事非烟】

棚友吴宓

• 谭优学 •

文教界中年以上的知识分子知道吴宓先生的人，大概并不少。据说《大英百科全书》里也列了他。可算一个“知名人物”吧。

但这标题得先声明一下：“棚”非“朋”之误，两字也不能通假，请校勘学家不要误会。

不管从哪方面说，我还够不上是吴先生的朋友，但确实是“棚友”，同在“牛棚”之友也。然而我知道他的大名，却是猗欤久矣。近日偶阅1984年《学林漫录》第九集金克木《记曾星笠（运乾）先生》那篇文章，其中有这么几句话：“……还有吴雨僧（宓）先生，是一位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特殊人物，却还未见有文章谈他。”不免触发了我想来补这个空白。不过说起新旧文化，我都是外行，说不出个什么道道来。这儿只记我与吴先生成为“棚友”前后的一些闻见和个人的想法。

以上算是“序”或者叫“引言”吧。

事情得从头说起，圣经贤传不云乎：“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么？“近道”何敢，为记叙方便而已。这得请读者不嫌我啰唆为荷。

大概是1937或1938年吧！那时我正在高中念书。一天，从《大公报》上看到一篇很长的大学各科“部聘教授”名单，记得中国文学有胡小石先生，英国文学是朱光潜和吴宓。至今印象深刻，其他的人名全忘了。为什么呢？大概因为我比较喜欢中国，而最感头痛的却是英文。从高小到高中，以致后来上大学，英文总是不及格。最难背的历史人名地名，我都记得，却偏偏记不得英文单词。因此，我对于英语学得好的人，总是肃然起敬，艳羡得很。即使在“不学ABC，照样闹革命”的喧嚣声中，也并未降低我的肃然和艳羡——不过，我“狡猾”，没有表现出来。从此我这个小小中学生，对鼎鼎大名的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吴宓先生，有了不忘的记忆。

上小学时，老师教了我们读《婉容词》，对作者吴芳吉很崇拜。后来知道吴芳吉就是白屋诗人，而且是咱们四川江津人，崇拜得更加虔诚。过了些年头，友人送给我一部《吴白屋先生遗书》，知道吴白屋吴宓二吴是挚友，还有《两吴生诗集》，也有《吴宓诗集》一大本，使我对吴宓先生就更加景仰了。学贯中西嘛，怎不令人佩服？不过他的诗集，很抱歉，

我却没有拜读。我得老老实实，不能冒充读了。因为在“史无前例”中，“造反派”经常呵斥我们：“要老老实实交代！”所以我至今是老老实实的。没读就没读，不能说谎。

后来，有点糟糕了。我从鲁迅先生的文章中，三次碰到他批评吴宓，大意说吴是中西文化的混血儿，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化身。新中国成立前夕，又学习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更不那么景仰了，尽仰，颈仰也仰痛了么！但对于他是英国文学部聘教授，精通外语，还是肃然起敬，很艳羡的。

1954年，我在一所高等师院附设工农中学担任教育工作。院领导为了提高我们学校历史教师的业务能力和历史教学水平，叫我们和历史系的教授讲师们开个会，见见面，以便今后帮助我们，我们好向他们请教。会上介绍时，就有吴宓先生在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头戴一顶褪了色的毛线睡帽，一套很旧的中山服，朴素得近乎寒碜，与他的名声很不相称。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却又使人有“一旦得见，雷从耳出”之感。我是欠恭敬，犯了“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的毛病。我想他怎么又搞到历史系去了？而不在外语系或中文系？当然不好问他，他很热情，表示凡来问的，一定尽量解答。这印象给我却很好，其实会后我们的历史教师并没有去向历史系的教授讲师请教，不知什么缘故，“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吧？很辜负了院领导的一番好意。大概生扯而不拢与？

1961年夏，我在某高校学习结业了，被分配到这所学院的中文系教书，第一次教研组会上，吴宓先生赫然在焉。他怎么又从历史系转到中文系了，却没有去外语系？我不解，也一直没去调查研究，“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是恪遵了的。根本不问这件事。从此，我就忝与吴先生同事且同组了

既在一个组里，何以没给他排课？他身体也蛮棒嘛。我刚去，记得让他教了一年级一个学期的“文言文导读”，以后就一直没他的课上。不过，学院办助教进修班，派他教英语，这可算发挥了他的长处。英国文学的部聘教授岂有不该教一个助教进修班的？这当然是领导的英明决策。后来得知他在班上可能因为讲语法造例句，造了“三两尚不足，而况二两乎”的句子。那是困难年间，就被领导和学员认为他在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从此被撵下讲台。文革中，批斗他时，少不了要举这个例子，证明他很反动。“革命群众”一举这个例子，无不义愤填膺，咬牙切齿云。原来当时的领导和学员中的积极分子认定吴宓很反动，是不能让他借讲台“放毒”的，所以从此没给他排课。他当时是学院仅有的两个二级教授之一，月工资270余元。有的助教这就有意见了：光拿钱，不做事，白吃人民血汗。其实吴先生是曾要求上课的。他说他有最简便的办法，三个月内可以将英语教上路，只要肯学，一定不难学好。也不知他那办法灵不灵，因为没有让他试验，怕他又来个三两二两的。我也没打算“老来出家”（去学），所以始终未去领教。

系里年轻助教舆论云，吴宓并不懂什么英国文学，只不过记得一些英国作家有几个女儿有几个儿子，恋爱过几次，她们的长相、性格、家世情况如何，作家屋子里有什么陈设，如此等等；或者一些文坛掌故，文人轶事而已，这有什么用？说不上文学。似乎他们比吴宓还内行，故能指出其短处。我是不懂英文的，也没有向他做调查研究，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我和他相处近20年，却从来没有听见他口吐一个英文单词，更不必说抛一句英文了，这和张乔治、李约翰、王玛丽之流，口中常抛出些洋文，迥然不同。算守旧呢？算什么的？我不清楚。

舆论既然如此，吴宓不但不通英国文学，一个同志说，就是中国文学，也没有什么修养的。例证是他认错了两个字。说他还自以为很热爱中国文学、中国传统文化呢！又一个同事向我抱怨：吴宓这人真无用，叫他校对教材，尽把简体字改为繁体字。的确他是从来不写简



化字的。吴先生反对文字改革，反对汉字拼音化是出了名的。因此为他的“花岗岩脑袋”

“老顽固”添了一条有力的“证据”。汉字改革是毛主席的指示，是鲁迅的主张。吴宓反对文字改革，就“等于”反对鲁迅，反对毛主席。非反动而何？看，多么严密的推理啊！所以文革中，列举其罪状，总少不了这一条。后来，我在想，吴宓先生是精通拼音文字的。和汉字比较起来，音符与意符文字的长短利弊，他应该是很了解的，何以还“顽固”地反对汉字改革？我不是文字学家，不懂。最近，一位朋友告诉我，逃居美国的林语堂，曾说过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大家都知道林语堂博士比吴宓先生更学贯中西，他也这么说，其意若曰，汉字拼音化，就等于毁掉中华民族的第二道长城。今天，第一道长城都不容毁，毁了的地段，还要修复呢。当然有些人可以下结论：林语堂、吴宓就是“一丘之貉”。这多干脆简明啊。吴宓抱住汉字不放，真叫作“顽固到底”。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树立了一种牢固的信念：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简言之叫政治挂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凡事绝对化不得，真理跨过一步就是谬误。不承认学术问题对政治有相对独立性，许多问题是扯不清楚的。否则就无所谓“百家争鸣”了。

吴先生很笃于友情。吴芳吉去世多年了，但他每月寄钱去接济吴的夫人和他的两个儿子。据说从未间断过。除了吴家外，他还接济一些有困难的朋友。吴先生不抽烟（而且讨厌抽烟），不喝酒，似乎也不买什么书，他的一些外文书都捐给院图书馆了，收入那么多而生活很简朴，他的衣着，在全院老教师中算最坏的，甚至有人目之为“老叫花子”。是“豪华落尽见真淳”吧？他每月270余元哪里去了呢？有些青年教师经过调查研究，断言：拿国家的钱去接济坏人了，是吴宓立场反动的表现。这又是吴宓的一条罪状。文革中“革命群众”批斗他时，也没有少掉这一条。

其实，吴先生不但“接济坏人”，“好人”他也是接济的。“好人”向他借钱，他都肯借。有些是存心借了不还，理由是：不义之财该拿来共产。“好人”不还，他也并不逼着要，久了也就算了。认真说来，吴先生在金钱上是慷慨的，并非吝啬鬼、守财奴那一类数的人。

文革中，我们被扣了工资，只发生活费。我向他借了近百元来生活，后来如数奉璧，他还感激称赞说，只有您这么讲信用啊。据此推知，对他不讲信用，借而不还的是大有人在。《增广贤文》曰：“酒中不语真君子，财上分明大丈夫。”大丈夫小丈夫且不去管它，与朋友信嘛，这恐怕应是做人的起码品德。

因为吴先生是个“高薪阶层”，我们刚成为“棚友”时，白天劳动，晚上“学习”。监管我们的“红卫兵小将”有一天晚上，“学习”完，叫我们各人滚回去，只留下吴宓，说是要对他单独训话。我们都很关注“训话”的内容，因为休戚与共嘛。但又不敢打听。这是“纪律”，不得违犯。记不清过了许久，终于知道所谓“训话”者，红卫兵小将要他出200元钱，作为捐献，支持红卫兵小将去“大串连”也。吴先生说他是“赎罪”。我们认为这是可耻的敲诈勒索。不但勒索了吴先生，另一“肥实”的“棚友”也是被勒索了的，且遵令不得泄露，否则，“一切严重后果，自己负责。”还是那位棚友的夫人——没有辫子，挂不起，毛着胆子去问那个“革命组织”，事情才敞开来。真是，在“格抄勿论”，“格斗勿论”，“格砸勿论”，“格抢勿论”之外，还发明了“格借勿论”，这也算“革命群众的首创精神”吧。我还是没有调查研究，不知“格借勿论”去的钱退出来没有？

吴先生离婚后，晚年曾得到一个女生的爱戴，后来作了他的夫人。可惜这位夫人患肺结核，不久就死去了。吴先生将她土葬在距学院数里外原是乱草坟的地方。文革中批判他时，同组一个青年积极分子揭发说，这个女人地主家庭出身，痨病鬼，吴宓爱她，她爱吴宓，心有灵犀一点通，立场同样反动，所以一拍即合云云。又揭发吴先生寝室中还变相供奉着她的

灵位。有一年清明节，吴宓还偷偷摸摸去上坟扫墓，烧钱化纸，大搞“封建迷信”云云。那位青年教师又是咬牙切齿，义愤填膺。

当我们第二次被“勒令”集中监管“学习”时，监督者忙于“革命”搞武斗去了。棚友们违背学习“纪律”，便不免闲扯起来。一次，吴先生不在，棚友中他的一个学生辈说，吴宓一辈子搞女人，弄得和师母关系不好，他们也不离婚，君子协定，分居各过生活，吴宓每月按约定给师母送生活补偿费。那时他们都在昆明，吴宓很守信用，每月领了薪水，当天即奔赴师母住处，笃！笃笃！敲开门，脸朝着一边，手递过钱去，师母接了，他转身就走，不看也不交言。又说吴宓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和一个有名的交际花叫毛彦文的，打得火热。毛要求结婚，吴宓老是迟疑不决。突然一天，吴宓接到毛寄来的结婚请帖，是和曾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结婚。毛37，熊73，年龄倒转巧合上海传为“佳话”。这可把吴宓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悲愤之余，赋诗抒怀有云：“奉劝世人莫恋爱，恋爱无益有百害。”吴先生的奉劝当然不起作用，世人照旧恋爱不误。我们听了，一阵哈哈。自幸没有拜读吴先生的诗集。但不知那位棚友所叙是否属实。我不是“专案组同志”，没有资格去“清”别人的“队”。无法核实。

也是那位棚友讲了吴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的另一件轶事。昆明当时有个牛肉馆，老板异想天开，招牌标为“潇湘馆”。吴先生是红学家，很气愤这家馆子胆敢亵渎林妹妹，提着手杖去一顿打，锅盆碗盏，盆盆罐罐，被砸碎一地。吴先生是社会名流，名教授，那牛肉馆老板只好自认晦气，谁叫你乱去附庸风雅呢？舆论说，该打。这或可看出吴先生维护传统文化尊严的憨厚直戆，可以发给精神文明奖。

1966年夏，从学习《五一六通知》起，到9月初我们被“揪出，挂起”那一段时间，因为搞运动——其实我们是被搞，规定天天到教研室学文件，写大字报揭发，我们能“揭发”谁？只有被揭发。吴先生的任何一句话，都是要挨批驳的。为了“加强火力”，领导还特从其他组调来几尊大炮——最革命的积极分子，专轰早已内定的我们几个。例如吴先生曾说，他在哈佛大学时，系里（院里？）办事人员只有一两个，事情却办得井井有条。这就不得了了，“大炮”立即发言，骂他是崇洋媚外，攻击了我们的人事配备，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引而申之，不是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吗？！真是“狗胆包天”！事后吴先生悄悄问我：“怎么现在他们对我这么严厉了？说任何一句话都错？”我说这是在搞运动，对我们老教师——当时还没有发明“臭老九”之称——要严厉些。运动过了就好了。哪料到一运动就是10年！连他的健步如飞，也被“运动”成了个跛子。此系后话，且按下不表。

196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们早已被抄被揪过了，战战兢兢地坐在教研室里。忽然一个“革命小将”叫我们出来，在巷道里站成一排，赏每人一块上书“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牌子，挂在颈上，亮在胸前。挂讫，押到大操场主席台上去接受批斗。啊哟，我的乖乖！济济一台的“牛鬼蛇神”！台下场上黑压压的一片“革命群众”。我们虽然是“一小撮”，但也不免有“浩浩荡荡”之感，并不觉得孤寂。吴先生就走在我的前头，躬腰站在我的旁边。批斗完毕之后，系里一个“革命小将”向我们宣布：从今天起，你们被专政了，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白天劳动，晚上学习，或写交代，准备接受批斗云云。

这里得诠释一下“棚友”之义。棚者，牛棚也。凡住入牛棚者，相互间，均得谓之棚友。人而谓之牛者，斥言之耳。牛系牛鬼蛇神之省称也。我为什么仿《公》《谷》笔法，之乎者也地解释一通？盖窃恐一百年后难住考据学家搞不清楚。用心该算是好的。

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住”牛棚，晚上是各自住在家里的。不可“诬蔑”“革命群众”。本来“革命群众”正筹设牛棚，勒令我们住进去，好监督管理。一时还没找到适合的地方，“保”与“革”之间便激烈斗争起来了。接着又是“一月风暴”和所谓“二月逆流”，他们忙于“揪走资派”，又接着弃文斗而武斗，“革命行动”忙煞了“革命小将”，也就无暇考虑我们的牛棚问题；当然我们很乐得如此。

我们的牛棚，其实是存放锄头、箩筐、扁担等劳动工具的地方。一片矮塌、潮湿、阴暗的瓦房。每天早饭后，他们遵令低头列队站在指定的教学楼前，恭聆小将一顿呵斥训诲后，就下降到牛棚，由队长分配任务，拿起工具就开干。这时，吴宓因为年纪大了，监管人默许他就留在牛棚里，为我们看守衣服。有时叫他烧开水，他却分不清水开没开，大家教了他辨认，还是搞不清楚。有一次，在牛棚附近插红苕秧子和栽大蒜，轻微劳动，叫吴先生参加。他分不清倒顺，都栽插反了，出了洋相。被舆论斥为“百无一用的老废物”“剥削生活过惯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云云。那时用脑子是不算劳动，只有种庄稼做工才算。让吴宓种庄稼哪能不出洋相？那年头出洋相的总是知识分子。至于从大字报和高音喇叭传出的批判词中，常常会碰到“向隅（隅）而立（泣）”呀，“现刑（行）反革命”呀，“沾（玷）污”呀，“七屈（屈）二中全会”呀，据说那正是“造反派脾气”的表现，谁敢说他们错了呢？“知识越多越反动”，愚昧是最革命、最好的。我曾暗中打油二句：“悔不当初事百工，亦未南亩学老农。”而今落得个“牛鬼蛇神”的恶谥，将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呜呼！彻底完蛋了。至于吴宓先生的完蛋，会比我更彻底，我想。

1968年夏，两派斗争又紧张起来。“革命群众”突然对吴宓采取了一次“革命行动”。抄走了他的“反动日记”。这可惹下泼天大祸了。不但自讨苦吃，还连累到我们。他日记里说，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罪状之一。日记说“姚文元在江青羽翼之下”，是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和“江青同志”、姚文元。罪状之二。日记里有些地方对毛主席的文艺讲话，说了不全赞同的话，“狗胆包天”，竟敢“唱反调”！罪状之三。我们在“学习”中，监督有时不在，不免对两派的某些事有长短得失的议论。他也记在日记里，而且记下是“某君云”。“牛鬼蛇神想翻天了！那还了得！”于是我们被勒令于某日上午去某处集合。其他系的几条“辫子”挨了毒打，杀鸡给鹅看。我们还挨了一顿毒骂。吴宓大概因为年老，免于挨揍，但被宣布为“现行反革命”，严加监管。还据说“两派同志都同意，公安部已批下来给吴宓戴这顶帽子”。这下真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1969年和1971年，我们都曾被赶到川东某县某乡的一个幺店子旁边去劳动和重新清队。住地原系劳改农场，以后学院就办在那里。

我们当然很清楚，“革命群众”是劳动锻炼和“清”我们，我们是劳动改造和被“清”。很荣幸，我的“罪恶”轻些，已放到“革命群众”中去受监督。领导宣布编组名单时，摆在最后，加了“还有”，以示区别。其实我并没有妄图混进去的意思。而“现行反革命分子”吴宓的几个棚友，“罪恶”大概重些，单独关在一边。三顿饭前，拿着碗筷，还要站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我虽有罪而不请了。谁愿意无罪去请罪来着？但“革命群众”只要高兴，随时可以喊着吴宓或我们的名字，奚落或臭骂几句，吴宓点头称是，我们默不作声。“秀才遇到（红卫）兵，有理说不清。”何况你根本无权说呢？“闭关自守”，是我们的基本对策。

一次，开吴宓的批斗会，会毕，两个最富于革命精神的彪形“革命‘大’将”把跪着的吴宓，凶恶粗暴地拖出去，这是按规矩不能由自己“滚下去”的。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一下

子竟把吴宓的一条腿整坏了。从那以后便成了跛子，再也不能健步如飞了。“革命群众”说，对“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不能手软的，否则便要丧失革命立场”云。

吴先生鰥居多年，由一个隔房的妻侄儿经佑他，给他当佣人。这个妻侄儿五短粗壮身材，流里流气，不三不四，说不准那是个什么人，总之，大家对他印象不好。吴宓先生为人忠厚，困难年间，上级分配给他“高知”享受的许多东西，买来都归他侄儿享用。前后两间屋，好的一间让给他侄儿住。这大概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吧。文革开始，“横扫”一切，那侄儿被扫回老家去了，吴先生已是“牛鬼”，当然不能有佣人了。白天进牛棚，早晚生活自理。人是个贱皮子，颠顿狼狈，也存活过来了。

从1972年开始，革命高潮已过，学校又逐渐从那么店子旁边迁回重庆。1973年，工农兵进大学“上管改”，当然“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找哪个做“黑靶子”呢？吴宓名气大，最合适。上头也派了人来住下一同整材料。整来整去，就是那么几条（如上文所说的），没有新的。“可恨”的是，这吴老头历史上连普通国民党员都不是，更不要说军、政、警、宪、特、反动会道门了。再打死老虎，激不起群众的义愤，收不到什么效果。“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斗吴宓，肯定抓而不灵，只好收刀捡卦，算了。这是粉碎“噬人帮”后，上头派来的那位同志，亲口告诉我，对吴宓曾有那么一场暗算。

对吴宓既然“算了”，组织和“革命群众”也就不再去管他。“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也就不翼而飞了。吴宓更加衰老，他后来雇了个中年妇女照看其生活起居。据说每月给好几十元的工资，他从不亏待佣人的。公私均忙于迁校搬家和给“上管改”的工农学员上课，事情很多，无暇去理吴宓，吴宓和这些事也全不沾边，再说，牛鬼蛇神哪有资格去沾边呢？我有时偶尔碰到他一瘸一跛地在他门前路上散步，女佣人的姑娘还得在旁边扶着他。招呼他，他却叫不出我的名字，老糊涂了，我想。

吴先生雇的中年妇女，早来晚归。听说有一夜，吴先生从床上跌下来，稀里糊涂在地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被女佣人发觉。年过80，记忆力消失殆尽，谁也不愿去看看他。说他精神上“晚景凄凉”，应是恰当的。

听说他两个女儿中有一个是党员高干，要坐小包车来看父亲。单位领导也为此忙了一阵。高干一走，“外甥打灯笼——照舅（旧）。”女儿也未能把固执的老父亲接走。后来吴先生的陕西泾阳老家，派人来将他接走了。落叶归根，狐死首丘，这大概是吴先生情愿的。

吴先生离单位归去，不知有人去送行否？我估计有也很寥寥。我们这批“棚友”就没有一个人去的。再则，那时谁又敢去呢？

大概是1978年吧，听说吴宓先生已在原籍老家病故。大概又过了一两年，由系主任主持在教研室里，开了一个规模小得不能再小的追悼会。历时大约十分钟。用意算是平反，恢复名誉。主持人报告中说，吴宓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反动派再三逼他去台湾，他坚决拒绝了。可见吴先生在政治上何尝无可取之处？！然而他自己从来没说，大家也是第一次才听到。从这件事看来，并不如“革命”大小将呵斥的“反动透顶”。反动容或有之？透顶则未必也。根据我近20年的观察，说吴先生思想反动，也还需要研究一下：正如毛主席所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般都是爱国的。他们对新社会一时还不习惯，有个适应的过程（大意）。我觉得这是很公平的。我从来就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话。用马列主义思想、共产党员水平（我这里说的是真正的共产党员）去要求吴宓这种旧知识分子，当然就百无一失，“反动透顶”了。这是时代的“悲剧”吧？“在劫难逃”！但我

深信、庆幸，在我们新的党中央领导下，这“悲剧”是不会重演的。“棚友”吴宓先生安息吧。

□ 来源：微信号《私人史》

~~~~~

【青春有悔】

在风暴中心

• 杨 瑞 •

1966年5月至12月间，也就是文革最初的7个月，我所经历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奇怪的是在当时，我几乎第二天就忘了头一天是怎么过的，身边发生的事实太多了，形势变化太快，我太激动，大欢欣鼓舞，太忙，太累，太糊涂，太不知所措……但这些当时忘却的情景并非一去不复返，有些事后来偷偷地潜回我的记忆中，使我蒙受莫大的痛楚和羞辱。我敢说这7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却又是最令人怀恋的日子。此前我从没对自己有过这么好的感觉，此后也再不会有了。

“文革”一开始就使我激动，令我神往，是因为我突然感到思想解放了，说话自由了。过去一零一中的老师兢兢业业地教育我们，出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中最难的题来给我们做，然而我们的智力提高了以后又如何？比如说我们从来就不可以质疑老师得出的结论，如果有人胆敢这么做，即使他说得完全有理，也会被扣上骄傲自大、不尊敬老师的帽子而受到批评。与领导意见相左那就更不得了了，各级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这个罪名足以把人送去劳改，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

如此，老师们制造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想把我们培养成聪明的、理性的、有头脑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我们做老师的小绵羊。他们这么做，实际是栽了一棵病树，不久就会尝到结出的苦果了。

“文革”在1966年5月爆发，我感到自己活像传说里的孙悟空，被一座大山压了整整500年，现在终于自由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们，允许我们造反。作为一个学生，我第一个要反的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她除了教书还管我们班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天天叫我们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

班上其他同学可能还会以为我是林老师的红人儿。她教我们语文，时不时会在班上念我的作文，这倒不假。（当然，只有她和我知道即使是这些范文，她打的分也不会高过85，由此可见班上其他同学分数会有多么令人沮丧。）她还选我作语文课代表，说明她对我这方面的信任。虽如此，我仍不喜欢林老师，她曾当众羞辱我，让我耿耿于怀。

我认为林老师就是毛主席所说那种与学生为敌的人。1965年我们去北京石景山首都钢铁公司劳动，有大晚上，突然有地震预报，上面让我们都坐在户外等消息，不得进屋睡觉。半夜时分，不见动静，凌晨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夜长得了无尽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坐了这么一夜，我昏昏欲睡，疲乏不堪，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放我们进到宿舍里，倒头睡一觉。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咕哝了一句：“唉，怎么还不地震呢？”

谁料想这么一句有口无心的废话叫林老师听了去！她突然提高嗓门教训起我来：“工人和贫下中农会说出这种话来吗？你想想地震会给国家财产造成多大损失，会有多少人员伤

亡，你居然在盼望地震！只有阶级敌人才盼望地震！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儿无产阶级感情？……”

她滔滔不绝地说呀说，尖锐的声音驱走了每个人的睡意，不但我班上的同学听到，其他五个平行班的学生也都听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坐着，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我们。300双眼睛！我无地自容，只感到脸颊在发烧。我真想为自己辩解，想对林老师说她的话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根本想不出地震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困得实在支撑不住，想让整件事早点过去，而且我说话的时候半睡半醒。我根本不是盼望地震！

其实我最想对她说的是我看穿了她的用心，我这句随便发发的牢骚话像一片轻烟，本可一下散在晨风中无影无踪，现在却被她揪住这么大惊小怪地做文章，她无非想在其他老师同学面前显示她的政治觉悟，将来好借此作为政治资本来兑现。也就不管我有多么难堪，多么下不来台

当然如果我作如此顶撞，我大概是活腻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还有完吗？我把转到了舌尖的话强咽回肚里，低下了头。热泪直欲夺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狠咬嘴唇，将它们忍住。林老师，咱们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跟你算这笔帐，你等着吧。

现在轮到受压迫的人扬眉吐气、伸张正义了。我当即拿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写下一张长长的大字报。用了林老师教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控诉她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与学生为敌，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我写完后给班里的同学一看，他们大表支持，纷纷签名。随后我们就将大字报拿到林老师家贴在她屋里，让她白天晚上读个仔细。这当然不能算作泄私愤，这只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果林老师为此有几个晚上睡不好，那她也该！这场革命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么？不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尤应“触及灵魂”。

林老师虽然算不上好老师，但她还不是最坏的。平空搞出个暴露第三层思想的政治老师比她更坏！过去学生中盛传他能看穿别人脑子里的想法，所以做起思想工作来百发百中。现在真相大白了：有位初三学生贴出了一张惊人的大字报，揭露他怎样会有这种特异功能的，那真是让我猜一万年也猜不出，原来他趁我们出去做课间操的当儿偷偷翻看学生的日记！写大字报的同学这天突然身体不适，提前回到教室，他亲眼看见政治老师将一本学生的日记从课桌里抽出来大看特看。这个学生当时不敢声张，政治老师正是他们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原来如此！它除了教人卑鄙和虚伪，还能教我们什么？过去我们那么尊敬他，他竟为我们树立这么一个榜样！想想他给我制造的那场恶梦，义愤油然而生。拿起笔作刀枪，我也给他来了一张大字报。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得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连父母都得向子女学习。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美猴王横空出世，法力无边。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想起来，“文革”开始时我感觉相当良好，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但就在这些新鲜的自由和热闹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喷泉过去是我们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周围空气洁净清新。在北京，这可不是普通中学能够享受到的奢侈。“文革”开始后，喷泉的水源被关闭，水池底部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夹杂着乱抛的纸屑和玻璃碎片。

此时我看见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右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我没心情再去吃饭，一丁点儿食欲都没有。

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竟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

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璧无暇的孩子，竟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说。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6月下旬的清华附中，比大部分中国人听说这个词要早近两个月。一个多么教人神往的字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

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们微笑的，也有向我们挥手的，他们眼神透着惊讶、新奇、激动和羡慕。我想我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恐惧？那时还不曾有。

行人向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悦色，感到神采飞扬。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父亲送给我一辆新车来表示他对“文革”的支持，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或者毋宁说是希望，“文革”能纯洁党的队伍，挽救中国的革命。）

时不时地我们同时按响车铃，散发出一长串的叮铃声。我们不是要行人让路，也不一定只是想引起人们注意，仅仅想听那悦耳的铃声。铃声直上云霄，清脆欢快，像一群带哨的白鸽在蓝天上盘旋。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铃声竟成了一曲前奏，不久便引导出一场吞噬全国的暴风骤雨来。

1966年8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天晚上午夜过后，我们从一零一中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黑暗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究竟会不会来，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星夜璀璨，我们唱起了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歌里，毛主席爱人民，他一定能听见，这可是我们的肺腑之音。

也许他真听见了，凌晨5点，东方将明，像奇迹般他突然走出天安门，走向广场，和他周围的人握手。广场顿成欢乐的海洋，所有人都在叫“毛主席万岁！”我身边的女孩哭，男孩也哭，我热泪奔涌，视线模糊，看不真切。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太高了，我们在下面的观礼台看不清楚。

于是我们热切地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他听到了，走过来站在天安门一角，向我们挥手。这下我可看清楚了，他一身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和我们一模一样。我热血沸腾，和广场上百万人一起雀跃欢呼，那一刻，小我不复存在，一切人我之间的障碍都不复存在。我像一滴水终于汇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奔腾澎湃，永不止息。我不再孤独。

当晚，我们自发地在一零一中狂欢庆祝。篝火旁，人人都扭起了秧歌。没人害羞，没人怕自己跳得不好。到这会儿，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却仍感到精力充沛，别人也毫无倦色。跳了几个小时的舞，我又一路骑车回家，跟父母分享这巨大的幸福。这些日子他们也不怕半夜三更被我吵醒了。事实上，他们还叮嘱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家，都要叫醒他们，告诉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见到毛主席极大地鼓舞了我的革命热情。第二天，我们几个红卫兵伙伴在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如果我们热爱毛主席，光叫口号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得采取点儿行动。可是

采取什么行动呢？到了这会儿，一零一中的老师都已批过了一轮，有的进了牛棚，连老校长王一之也被拉下了马，因为她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有牵连。（当时刘少奇尚未受到公开的批判，应是作者记忆错误。——编注）在校园里我们已找不到什么对象可供造反的了。于是有许多红卫兵冲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怎么办？破“四旧”吧，可是得先找到目标。我建议去附近的饭馆儿移风易俗，大家都说好，一行人跳上自行车，绝尘而去。

饭馆里的食客见一彪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不由一阵紧张。到了8月，人们开始害怕这些呼风唤雨、到处制造红色恐怖的年轻人了。饭店里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盯在我们身上。

我向前迈了一步，煞有介事地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接着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同志们，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尤其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那样让人伺候。从现在起，想在这个饭店吃饭的人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一、自己去窗口拿饭菜；二、自己端到桌上来；三、自己洗碗洗碟子；四、要的饭菜必须吃完。否则，不准离开饭店。”

我一边说，有几个顾客一边开始变色，额头都渗出汗来了。他们点了太多菜，现在他们得在红卫兵众目睽睽之下吃完所有的饭菜，这可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儿。不过顾客们没人敢跟我们争辩。顶撞一群霹雳火似的红卫兵，那他真是活腻了。于是他们个个埋头猛吃，肯定有人为此得了消化不良，但我觉得他们活该，谁让他们在饭馆儿摆谱，点了饭菜吃不完，浪费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下给我们逮住，让他们丢丢丑，下次接受教训！

就在我和战友们在饭馆儿破“四旧”的同时，其他红卫兵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抄家活动。一时间捷报频传：红卫兵抄出了枪支弹药、变天帐、金条外币、黄色书刊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那个小组的同学坐不住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抄家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也没往深里分析，只道：“我们在饭馆儿闹革命，不也有很多事干么？”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芊绵婀娜的竹子倚着太湖石，鹅卵石曲径通幽处，兰菊丛生。回廊边，有一架藤萝，古色古香的鱼缸里，金鱼在睡莲下悠游……

奇怪！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为什么似曾相识？难道我在梦里到过这个院子？……

我进而恍然大悟：这个院子十足像是奶奶家的格调。奶奶的家恐怕早被人抄过了，可能还抄了不止一次。还在那儿住么？有没有被赶出去呢？现在不知她身体怎么样了，还有那些花，她和姑姑种的那些牡丹月季……想这些又于事何益！我现在反正也帮不了她的忙，她是资本家，我是红卫兵，得跟她划清界线。

眼下的问题是拿这些花草怎么办？砸烂它们！连根儿拔了它们，再踏上一只脚？花鸟鱼虫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未来的新世界里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我的伙伴们都已经动手了，我可不能落后。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乓！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乓！乓！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

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剩下的花草处理完，并保证几天后一定会回来检查。就这样我们扬长而去，身后是一片狼藉，破瓦碎砾，落英残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回家的路上，钟馗遇上了捉鬼的：我被一路不认识的红卫兵迎面拦住，他们指着我的长辫子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我环顾四周，当街两边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剪刀。任谁留了长发或头发带了卷儿的，都被他们一一喝止。随即操起剪刀，在周围看热闹孩子的嘘笑声中，当场三下两下把头发剪短。我不由涨红了脸，在街上被人剪头发真是太丢丑了。我于是求他们，保证一回家马上就自己剪。他们放过了我。作为权宜之计，我当即把辫子盘在头上，用军帽遮得严严实实。

我生怕走在街上还可能碰到其它事，便径直回了家。一进门，见二姨一脸晦气，原来她也在街上看见红卫兵剪别人的头发，吓得她不敢出门，眼看家里的青菜萝卜就快告罄。

“叫我怎么办呐？”她问我，“我要是剪了头发，不成老妖精啦！一头的老白毛扎煞着，还不吓死人？”她一脸愁容使我想到二姨自小就留着头发，婚前是一条油光水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婚后改成盘在脑后雍容典雅的发髻。即使在瑞士，她也从未变过发型。可是眼下，她和我似乎都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想在街上丢脸惹事，还是在家里自己处理为妙。

就在二姨和我相互剪头发的同时，父母则在厕所忙着烧东西。想法都是一致的：与其被人抄出来，既惹麻烦又没面子，不如自己先把“四旧”除掉，防患于未然。于是他们把几本旧书烧了，还烧了一些过去的信和照片，灰烬从厕所冲了下去。这叫未雨绸缪，实为明智之举。谁也说说不准下次抄家会挨上什么人，作最坏打算大抵是不错的。

我家似乎突然人人自危起来。连11岁的小炼都陷了进来。他的麻烦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小炼3年前在一个堆放木材的货场地里玩捉迷藏时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它小得连牛奶都不会喝，二姨教我们将牛奶倒在瓷汤匙里，让牛奶沿着匙柄的槽慢慢流进小猫的嘴，它尝了尝，还行，于是往下咽。日复一日它长成一只大猫，黄色的毛间杂了黑色条纹，前额有三条横线，活像汉字里的“王”，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虎子。

虎子的生命现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宠物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那天早上，炼收到了邻居家孩子的最后通牒，通牒说我们若在三天内还不把虎子处理掉，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这下我们慌了神，虎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总得给它留条生路吧。

二姨建议我们将它装在布袋里，带到很远的地方，把它放了，让它变成野猫算了。这个主意不坏，但我可不愿被人看到一个红卫兵偷偷摸摸在书包里藏只猫。我吩咐小炼去干这事，自己回了学校。“文革”伊始，我便在学校宿舍弄了个铺，晚上几乎都呆在那儿。

几天后我回家，二姨告诉我虎子的悲惨下场，小炼躲在一边，不理我。当小炼提了布袋出门，被那几个下最后通牒的孩子看了个正着，他们见布袋在蠕动，猜到是猫藏在里边，于是他们抢过布袋，水流星般地转了几转，狠狠地砸在砖墙上。“喵！”虎子惨叫一声。男孩们开心极了，他们一次次将布袋砸在墙上。小炼哭丧着脸求他们住手，没人肯稍加理会。虎

子的血把布袋染得斑斑点点，墙上都留下了深色的印痕，它还活着，叫得一声比一声弱，一声比一声可怜。猫有九命，算它倒霉了。顽强的生命力只能延长它的痛苦，给这帮男孩增加几分快乐。嘭！嘭！虎子终于没声没息了。小炼跑回家趴在二姨身上哭了好久。

我家的猫被恶作剧地弄死后一星期，一个我唤她作姑妈的邻居自杀了。那天我正巧在家，忽听得一阵喧闹，探头看去，楼下站了许多人。我一下楼，清清楚楚看到姑妈把自己吊在厕所的水管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印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

她为什么自杀？没人知道。死之前，她是学院的打字员，本本分分，不惹是非，既没有历史问题，也没人和她过不去。人们猜她的死是为丈夫的缘故。

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颇有戏剧性，我听母亲说一位作家曾经采访过他们，想为他们写本书。姑妈的丈夫，我称作姑丈的，是法语系的教授。我过去很喜欢他，因为他举止斯文，涵养极好，藏书又丰。却不知为何，最近查出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年青时在法国参加过共产党，但后来脱了党，远离政治，因此他被指控成变节分子。后来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姑丈的故事，使我觉得他果然有几分像我在革命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贪生怕死的叛徒。

故事说就在姑妈自杀后，姑丈也动了轻生的念头，他去了颐和园，一头扎进湖里，可是他跳的地方水太浅，不一会便爬了上岸，说这儿的水实在大凉。学院的人把这事传为笑柄，连二姨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妈这么个弱女子，决心恁地大，而姑丈这么个大男人，连这点子勇气都没有。”

这话有些不祥之象，说真的，我当时就有所觉察。几天前，附近的农业大学里一个保姆自杀了，她可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那她又为哪般？

她可以说死于破“四旧”。近日来这场群众运动又揭开了一个新篇章，其实这倒有点合乎我的想法：过去资产阶级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让别人伺候。新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彻底破除，劳动人民不应再受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定下个新规则，规定资本家不准雇保姆，而不是资本家的实际上也雇不成保姆，因为雇了保姆就意味着你成了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来等于说什么家庭都不允许雇佣保姆了。

结果就逼死了那位老太太。她没了工作，又没孩子赡养她，就算存下一点儿养老的钱，另一个新规定又把这些钱冻结在银行里。

二姨也面临着完全同样的窘境。她来我家时才46岁，现在她62岁，儿子死了，女儿又音讯全无，按说她已步入老年了。目前她所有的钱都冻结在银行里，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取出这笔钱，都是未知数。红卫兵定出的要所有保姆走人的期限却越来越近，二姨教我感到不安，我怕看她的眼睛，它们看上去一下子离我非常遥远，似乎存在于另一世界，我捕捉不到她的目光，而且她还总说些奇怪的话，诸如决心什么的，她不是也……？

二姨走的前一晚（幸而她还留着老房子，不致无家可归），父亲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十分严肃地向二姨保证，只要她活一天，我们就赡养她一天。虽然她现在不得不离开，但她永远是我家一员，她不必为老来无靠担忧。

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至今我仍为30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夜父亲说的这番话叫好。那时北京就有成千上万名保姆被赶出雇主的家门，全国就更不计其数了，但能作出父亲那番慷慨承诺的雇主能有几人？

二姨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她很感动。此后她便一心一意把我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家。她不是负担，而是支柱，在我家风雨飘摇的10余年中，为我们苦苦撑着它，直到耗尽全部精力。

□ 来源：杨瑞：《吃蜘蛛的人》第13章：在风暴中心

~~~~~

## 【亡灵祭坛】

### 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

• 解 滨 •

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细说了文革中严凤英之死。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报道，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这一篇文章把这隐瞒多年的细节披露了出来。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然而，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杀人越货的，强奸的，只要被抓住，还是要下大狱的。就是那些当时没有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是继续追捕。文革中还有些案子，在没有给凶手定案之前，永远都不能结案。即便凶手死了，也还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不光是要给死者的亲属和后代讨一个说法，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严凤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屁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那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1944年7月20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78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极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碑下跪了，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

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1967年底他作为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乡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住在哪，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要忘记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

□ 来源：香港《开放》杂志2010年2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